

中国文学

“白马湖作家群”的民间性格

张堂铸

摘要:本文以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所形成的“白马湖作家群”为对象,讨论他们的民间性格,分别从“学在民间”、“到民间去”、“新村意识”三个方面,说明并探掘这群作家以民间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从而提供我们观察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性格的一个真实切面。

关键词:白马湖作家群;民间性格;新村;春晖中学;立达学园

一、重返民间:世纪初知识界的觉醒运动

“民间”一词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复杂概念。本文所指涉的主要是指与国家机器/官方权力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意义下,知识分子的民间性格正表现在与当道/庙堂的保持距离,甚至相互抗衡上。在政治意涵上,它比较接近于“朝野”的“野”;在社会意涵上,它指的是“公众”或“平民”。它不等同于农村,也不是专指民俗等文化范畴,用比较通俗的话说,“民间”较接近于是一个“位置”,是一种“立场”。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阶级,透过科举制度,入朝可为官,居乡则为绅,位于四民之首。凭借知识与学问,士大夫可享一般平民所未曾享受过的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权,在心理天平上,他们毫无疑问的是向庙堂倾斜的,即使身在江湖,也心在魏阙,仕途若不顺,则不免失意寡欢,嗟叹有志难伸。回归民间,往往是被庙堂抛弃之后的无奈选择。一直要到二十世纪初这个大转变的时代来临,随着士大夫地位的急骤下降,知识阶级的特权不再时,他们才成为与一般平民无异的“公众”的一部分。加上五四

时期人的觉醒与个性解放的思潮推涌,使他们的心理天秤自然地民间倾斜。郑振铎说得好:“拿笔杆的人们开始明白,笔杆与算盘、犁耙、斧尺等等是同一的谋生的工具,并不比他们更高尚或更能干。”这种自觉,使知识分子开始认识了自己的真实社会地位,也才甘于寻找一个民间岗位安身立命,并且力图摆脱来自国家庙堂的控制,建立一个属于民间的“自己的园地”。

这种“重返民间”的认知,是二十世纪初思想界、知识界的一次普遍大觉醒。白马湖作家群也不例外。在我看来,白马湖作家群的民间性格的具体表现有二:一是在民间坐实教育、出版等知识分子的岗位;二是坚持“学在民间”立场,结合农村改造,甚至从事新村建设、面向人类乌托邦世界的理念与实践。这两种实践,都宣示了

郑振铎:《〈编者〉发刊词》,《郑振铎文集》第4卷,第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白马湖作家群”是指1920年代初期,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任教、生活过的一群作家,包括校长经亨颐、教师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刘叔琴、匡互生等,可视为此一作家群的主要成员。另外,还有一些与这批作家在当时往来密切,也曾到过白马湖短暂访友或小住的,如叶圣陶、俞平伯、刘大白、弘一法师等,可视为白马湖的次要作家群。

他们不与当道合流的决心,以及以民间为本位的主动抉择。以他们为样本,我们可以观察到二十一世纪初知识分子性格的一个真实切面。

二、从“学在民间”看白马湖作家群的民间性格

自孔子首开私人民间讲学与著述以来,私学与官学并存的现象便不曾断过,甚至对中国学术文化的保存与发扬,有时私学比官学的贡献还大,因此,“学在民间”可说是中国教育的一项传统。在新式学堂成为政府统一的要求之后,民间的书院、社学、私塾、讲堂等也不曾消失。而民间办学的存在,其最大的意义与贡献,正是对一统化的教育体制的对抗。尤其在政治动荡和社会转型之际,“学在民间”往往成为维系文学价值与学术道统的重要支柱。二十年代的中国,在政治上正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加上新旧文化/思想的剧烈冲突,“学在民间”的价值就显得特别突出,知识分子也特别能体会到,文化学术的存续与发扬,不必然要靠政府的支持,反而可以借助民间的力量,寻求经济上与思想上的独立。换言之,透过知识者自身的选择与努力,学在民间不仅更具活力,更能自由发展,而且更能实践教育理想。

春晖中学的创办,正是此一理念下的产物。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日,春晖中学举行开校典礼,校长经亨颐特别在典礼上向学生阐明这个观点说:

近年来奔走南北,有一种感触,觉得官立国立的学校,现在实不能算好,但要怎样才能办好呢?这条件回答是很难的。我第一希望社会能同情于春晖,第二希望校董能完全负责,第三希望有安心的教员,第四希望有满意的学生。这四种是学校办好的条件,官立国立的学校或不能如此希望,春晖却是可如此希望的。

经亨颐的寄希望于春晖,肇因于之前在浙一师的风波,他显然认为浙江教育当局落后保守的心态与强势干涉的做法,是难以改变的,在

极端失望下,他才愤而挂冠。也正因为官立学校的不得受制于当局,无法充分实现他的教育主张,遂决定在白马湖畔另辟一个新园地来实践他的理想,而这个新园地所强调的正是“私立”两字。为了彻底排除官方势力的介入校务,贯彻其“反对旧势力,建立新学风”的主张,他甚至不向当时的军阀政府立案。在热心教育的上虞乡贤陈春澜的经费赞助,以及一批知名教师的全力投入下,不到三年,这所地处偏僻的私立中学,竟然名闻全国,而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誉。春晖的办学成功,原因不止一端,但其民间本位的私立性是不容忽视的根本原因。

经亨颐始终认为,要做到教育自主,必须不依附政府。他在春晖如此,在担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时也是如此。浙江省教育会是当时全省教育界的民间组织,以“研究教育事项,力图发达教育”为宗旨。清末成立时称“浙江教育总会”,一九一二年重组,改名“浙江省教育会”。一九一三年经亨颐继章太炎之后出任会长,此后连连连任,达八九年之久。他任会长期间,切实贯彻蔡元培制订的民国教育方针,工作开展得勃勃有生气,对浙江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多有贡献。经亨颐领导省教育会,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作法,即坚持独立自主精神,不依附于官府,不为官府所左右,他曾公开宣称:“教育会非官厅之佐治机关,会长非隶属于官厅之佐治员,故官厅不能以命令行政教育会,亦不能用命令行文教育会长。”经氏再三强调教育之不受官方控制的立场,说明了他一贯坚持“学在民间”的思想。

经亨颐民间办学的理念显然得到春晖师生

陈平原在《中国教育之我见——答日本〈文〉杂志问》一文中曾提到:“1949年以前,由于政府经济及管理能力有限,私学仍长期存在。1947年,全国专科学校中,私立者占38%(上海甚至达到75%)。中、小学(包括私塾)中,私学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见《游心与游目》,第9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引自陈星《教改先锋——白马湖作家群》,第18页,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96。

见春晖中学60周年校庆纪念委员会编《春晖中学60周年校庆纪念册》中的《校史》一章,第18页,1981。

张彬:《与时俱进的教育家——经亨颐》,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近代著名学校和教育家》,第28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的支持。夏丐尊在第二年校庆时写了一篇《春晖的使命》(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春晖》半月刊第二十期),文中呼道:

你是一个私立的,不比官立的凡事多窒碍。当现在首都及别省官立学校穷得关门,本省官立中学有的为了争竞位置、风潮迭起、丑秽的不可向迩的时候,竖了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不是你所应该做的事吗?

正因为官立学校的“凡事多窒碍”、“丑秽”,夏丐尊认为要办“纯正的教育”惟有私立民办才能达成。与当道划清界限,自筹经费,自编讲义,有独立的思想人格,正是他们民间性格的具体表现。当官方的控制力愈薄弱,他们认为,学术文化教育的纯正性就愈能守住。

朱光潜对此也有精到的见解,他的《私人创校计划》传达出清楚的民间立场。他认为,当时的学制使各学校都无特长而有通弊,要想免去通弊,先得脱去“学制”的圈套,而学制与“官”是相连的。“在目前政治状况之下,教育决不能官办”,其理由有二:一是一旦战争发生,学款会立刻移作军费,校舍会变成兵房马厩,教育将因此停顿;二是一旦官办,教育者便不能行政中立,甚至扭曲人性,逢迎争位。朱光潜说:“学校既隶于官府,只有会逢迎阿谀的政客可以攫取校长;只有甘与这种校长合作的人肯当教员。这一般人都要欺骗良心以媚社会,才能维持位置。他们的人格已根本不能为人师。拿他们来支配教育,只能教天下人剥丧廉耻,相率为非。”在二十年代“教育独立”呼声甚高之际,朱光潜的看法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一再强调,当时的官办教育腐败,根源在于军阀政治腐败,所以要改革教育就必须让教育摆脱军阀政府的控制而取得独立自由的地位。对于春晖的教育方针,他完全认同,后来立达学园创办,他热心地为筹经费、建校舍而奔波,因为他相信,只有透过这样完全民间民办、独立自由的学校,他和一群志同道合者的教育理想才能真正实现。

即使是办出版社,朱光潜也主张,“一个理想的书店应该脱离官办与商办的气味,由读书

人和著书人自己来经营”,以保存、传播学术文化为主的出版机制。他仍认为应摆脱官方的介入,其“学在民间”的理念可谓一以贯之。可以说,不论办学或出版,白马湖作家群的努力已充分显现出这种民间性格。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全国高等教育的领航者、北大校长蔡元培应邀至春晖中学演讲,开头就表示很羡慕春晖中学是个私人创办的学校,接着又说:“现在中学已多,有官立的,有私立的,诸君所入的中学却是一个个人创立的学校,尤为难得。”他特别举陈春澜的办学热忱为例,说明春晖中学的民间私立特色,既值得期待,又令人羡慕。身为政府官办的“国立”大学校长,肯定民间办学之重要,自是深具意义的。

白马湖作家群“学在民间”的理念在春晖得到部分实践,后来因发现当局政治势力悄然入侵,前述之“丑秽”情状开始出现,包括经亨颐、丰子恺、夏丐尊、朱光潜、匡互生、刘熏宇等人立刻断然辞职离校,而在一九二五年创办了完全由这些知识人规划、筹款而成的立达学园。立达的诞生,比起春晖更进一步地体现了他们的民间性格。《立达半月刊》中说道:“这个学校,立达的办起来,既不是受了官厅底委派,也不是受了某资本家的资助,完全由现在当其事的人本了自己的意志,为满足自己的要求的努力。”对于官办教育的腐败,更是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

我们坚信腐败的教育不能解决纠纷的政治;纠纷的政治,更不能改良腐败的教育;我国官办的教育,我们承认已无法弥补,对于教育有觉悟又抱决心的志士,在这种积弊之下,不是感受处处牵制的痛苦,就是被融化于这种洪炉烈焰。倘若我们还不及早从倚赖官办教育的迷梦中警醒,将来病根益固,恐至于无药可医的地步了。所以我们决计脱离圈套,另辟新境,自由自在地

朱光潜:《私人创校计划》,《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10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488页。原载《天津民国日报》1948年8月23日。

蔡元培:《在春晖中学的演说》,浙江省上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白马湖文集》,第200页,1993。

去实现教育理想。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国事日非之际，回到民间，才是知识人最好的出路，也只有在民间兢兢业业的耕耘，释放无穷的活力、鲜活的思维，才能回射到上层当局，促成良性的竞争，进而完成宁静的教育改革。这是他们的理想，也是他们“书生报国”的另一途径，不管官方的认同与否，支持与否，不畏惧地坚持，就是他们的知识分子风骨。

有一件事可以生动地说明这种风骨。当这批作家一面在立达学园从事教育改革时，一面也积极地投入开明书店的编写与经营工作。抗战期间，暂迁四川成都的开明书店曾将田世英编的地理课本送审，教育部却以书稿上未写明四川是抗战根据地等为理由退回，要求修改。身为书店总编辑的叶圣陶支持田世英的意见，认为教育部讲的是政治宣传，而非地理学本身的事实。叶圣陶说：“教材不是宣传品，我们不能指鹿为马以欺骗学生。‘国定课本’这块金字招牌我们不要。”于是，书名改为“开明新编初级本国地理”后，内容未改即予出版。叶圣陶这种不要“国定”，坚守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与学术良心的决定，不就是因为开明书店的民间性质及叶氏的民间性格使然吗？

三、从“到民间去”看白马湖作家群的民间性格

二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曾经出现一个响亮的口号：“到民间去”。许多知识分子接受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开始倡导“到民间去”运动。这里的“民间”，与前述“学在民间”的意义不同，如果把“到民间去”改成“到农村去”，大致不差。虽然“民间”的场域不同：一在学校、出版，一在农村，但其走向民间这个“位置”的方向并无二致。

李大钊是这场运动的思想领袖。他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二月的《青年与农村》一文，可以视为这场运动的先声。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劳动阶级绝大多数的国家，而中国农村的黑暗已达于极点，农民若是不解放，就等于全体国

民不解放，而他们的苦痛，就是国民全体的苦痛。换言之，只有解放农民才能解放中国，因此，“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他进一步提出，要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知识阶级”要加入“劳工团体”。他最后呼吁，青年们要多多到农村去！李大钊的呼吁青年奔赴农村，主要还是起因于列强瓜分和军阀割据的国家忧患意识，希望能从事农民教育，改善乡村落后的现状，进而提升整体国力，对抗强权。正如另一位乡村建设理论的先驱梁漱溟一再宣称的，这不是“替一乡一邑想办法”，而是欲“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走”。

在李大钊的号召下，北京大学的一群青年学生率先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有邓中夏、罗家伦、俞平伯等。该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他们的活动持续到一九二五年，人数也由最初的三十九人发展到七十人。至于讲演团的活动主要是印发传单、组织正式及非正式的演讲会。讲演的题目有实用性的“吸烟的危害”、“读书识字的重要”等，也有政治性的“还我青岛”、“山东的危机”、“现在的皇帝倒霉了”等。五四以后，他们的活动范围便从北京扩展到北京市郊、农村。随着国家局势的日渐恶化，鼓励青年下乡教育农民的呼声日涨，二十年代著名的报刊如《晨报》副刊、《努力周报》等，都曾刊载过“到民间去”一类的文章，鼓吹青年学生投身乡村改革的行列，担负起教育农民的责任。

见匡互生《立达、立达学会、立达季刊、立达中学、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编：《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2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王知伊：《开明——文化人办的书店》，《开明书店纪事》，第5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48-649页，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见《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9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讲演团的成员还有后来在中共早期党史上极具影响的人物张国焘，以后成为《歌谣》周刊编辑的常惠等。

见〔美〕洪长泰《到民间去》，第20页，董晓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以上的叙述,恐怕还无法说明二三十年代“到民间去”、“乡村改良”运动的浩大声势。其实,早在一九〇四年,河北定县人米迪刚,就曾在家乡翟城村实行过“村治”实验。一九一八年,黄炎培等“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也在江苏昆山的徐公桥开辟了“乡村改进区”。此后,李大钊、朱其慧、晏阳初、陶行知等一批批知识分子,怀着改造农村的热情,纷纷跑到农村,投身于形式各异的农村改良运动中。他们有的重视义赈救灾,有的侧重于乡村教育或乡村服务,有的从事于农业技术的改良与推广,形成一股颇具声势的农村改良浪潮。当时喊出的类似口号或主张即有“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农村革命”、“农村改造”、“救救农村”、“复兴农村”、“开发农村”等。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可以说明这股席卷全国的热潮,据统计,三十年代初期,“全国从事乡村改良运动的团体达六百多个,他们建立的乡村实验点或实验区有一千多处”。

以今天来看,“到民间去”的种种理论、方案与实验,自不免有其肤浅、不正确之处,不论是梁漱溟、晏阳初或陶行知的乡村建设,都未能为中国开出一条到达现代化的新路,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以陶行知来说,他于一九二六年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所起草的《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就是一份充满理想色彩的乡村改造蓝图。他提到,要以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以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主张由乡村实际生活产生“乡村中心学校”,进一步产生“乡村师范”,而乡村师范之主旨即在造就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他还大气魄地呼吁:“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这种改造国民性从乡村教育着手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当时农村教育的一项浩大的“希望工程”。至于梁漱溟能够在政治、经济之外,强调乡村教育必须取道民众教育、社会教育,也是深有见地。他说:“余为民众教育工作不外固定的与流动的两种:固定的如教育民众读书识字,在使民众获有一工具耳;流动的则要因地因时制宜……总之,吾人今日所从事之工作,从目的说,为乡村建设,从方法说系民众

教育。”不论在理论或实践上,教育都被梁漱溟视为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方法,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具体要求在农村开办农民夜校、为农民举办短期培训班、传授农业科技知识等,这在今日农村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仍有其正面功能。

陶、梁等人的可贵,在于不仅致力农村改良理论的宣扬,而且付诸实践。陶行知的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等地的实验,还有江恒源等人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晏阳初等人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二十年代后期也分别在江苏、河北进行了实际的乡村实验。这一批批的知识分子,满怀理想地走入农村,走向民间,对在春晖、立达办学的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的启发作用。从白马湖作家群相关资料中,我们可以很具体地看到这场运动的广远影响,而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再次印证他们站稳民间立场的属性。

白马湖作家群的核心人物夏丏尊在《春晖的使命》一文中,曾针对这一点提出他的看法,他说:

你是生在乡间的,乡村运动,不是你本地风光的责任吗?别的且不讲,你可晓得你

原数字数据见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第2集,第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35。转引自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第15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书中一篇题为“对于各家批评的总答复”的文章中指出:“以往种种乡村建设的尝试,似乎太偏重了文字教育、卫生等一类并不直接增加农家收入的事业。这些事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它们是消费性的,没有外力来资助就不易继续。要乡土在自力更新的原则中重建起来,一切新事业本身必需是要经济上算得过来的,所以乡土工业可能是一种最有效的入手处。”他从经济角度分析认为,从工业下手才能真正达到乡土建设,与梁、陶等强调教育的看法不同,各有所重,但也各有所偏;又如陈思和则在《我往何处去》中(收入《还原民间》,第10页),指出知识分子若想靠“一揽子计划”来解决所有问题是行不通的,他因此认为“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关心了中国民间问题却走不通‘现代化’”。见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第8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上册,第487页。

附近有多少不识字的乡民?你须省下别的用途,设法经营国民小学、半日学校等机关,至少先使闻得你钟声的地方,没有一个不识字的人,才是真的。至于你现在着手的农民夜校,比起来那可说是你的小玩意儿,算不得什么的。

使听得到春晖中学钟声的地方,没有一个不识字的人,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使命啊!农民夜校、半日学校,这不正是改造乡村从教育下手的理念吗?他们真的做到了。一九二二年应聘进春晖中学教务处工作、有时替代丰子恺上图画课的叶天底,就写过一篇《白马湖上伴农民读书半年》,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春晖》第十一期,文中对农民夜校的活动情形有详细的记载。夜校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开校典礼举行后不久开办的,课程有六门:习字、常识、珠算、时事、农事、国语,以实用为主。叶天底担任的是一星期四个小时的国语课。他提到,农民的年龄、程度不一,为求达到效果,以写信、红帖子、契票等日常用字开始教起,半年下来的成果,他举了一封学生写给他信作了生动而有趣的说明,信是这样写的:

叶先生:

你近来贵体康健个吗?我今日有些事体要拜托你,我的妹妹现在已经好读第二册了,费你的心。给我办一本来,可以吗?我很要谢谢你,还有明日吃午饭,你请得过来,我家分岁,山边的路都燥了。你千定万定要来的。敬祝你贵体康健。腊月二十九。赵汉元上。

叶天底欣慰道:“我读了这封信,心窝里感觉着一种不可捺的奇痒,正和当时读了一封感情最亲密的一个女郎寄来的信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中国的大江南北,像赵汉元这样的人定有许许多多。春晖地处偏僻的乡下,显然,它毫不迟疑地响应了这个具民间色彩的自发性运动,而且与白马湖作家群的理念是相契合的。例如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就有一封信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他说:“总而言之,到民

间去,要到民间去,先要把学生架子丢开。”鼓励青年学生放下身段,走到民间去;又如朱自清那句格言式的呐喊,“觉醒的个人,认清了自我——这些知识分子于是开始的‘向民间去’”,他强调五四的时代意义在于打倒了权威的“老年代”,建立起独立的中心的“青年代”,对于青年,对于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他语重心长地提出了以上的呼吁。这是他对历史的理解及对知识分子的期待,其中流露的还是深深的民间本色。

经亨颐对此虽未发表过直接的意见,但他是极力主张农民夜校的开办,学校一成立,夜校就开始上课,说明了他的积极支持态度。创办之前,他还邀请了农学家、茶叶专家吴觉农来校讲演《对于春晖中学的几个希望》,其中便谈到农民夜校成立的问题。吴氏肯定春晖创办夜校的用心,但他也认为,现在农民所需要的是农业技术方面的革新、农民生活的改造和农民相互互助以便养成消费贩卖等共同的行动等,这比识字更为重要,“识字固然是教养的初基,但我更希望春晖的师生们能够对于农业技术的改革、农民生活的改造格外留意一下!”夜校在课程上既有习字、国语,又有农事、珠算,可说是完全符合吴觉农的希望。在经亨颐的推动下,春晖师生透过教育农民的实践,可说是融入了整个时代环境所要求的进步潮流中。

立达学园在另一位也具有民间性格的匡互生的规划、推动下,对乡村改造一样投以热烈的关注。他坚决反对学生和社会完全隔绝,认为这只是死读书。立达位于上海江湾校舍的邻近,有模范工厂、妇女救济会等,其中有不少平民,于是他着手进行“平民教育”的工作。和春晖不同的是,他的教育对象扩大到劳工、妇女,不仅是改造农村,而是教育一切平民。由于学校处于农

朱光潜:《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第21页,原于1929年3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收入《朱光潜全集》第1卷。

见朱自清《文艺节纪念》,写于1947年5月20日,收入《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48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原载1922年12月《春晖》第4期,收入《白马湖文集》,第195页。

村中间,学生和农民经常往来,在冬季农闲时期,匡互生不忘举办“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进行识字教育。还设立立达小学,免费招收学校附近农村的学龄儿童入学。农教科所办的附设小学与农民夜校就有十来所,完全由学生负责管理,一方面与农村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作为学生的实习所,对农村改造贡献了不少心血。匡互生的学生金廷辅曾有一文回忆这件事:

他就在农教科附设小学部,聘请专任教师和同学兼课,对高年级学生实行半日读书,半日在家参加田间劳动。学生全部免费入学。同时在各村庄办夜校,由立达同学轮流去教农民识字,学文化;农民十分感谢匡先生。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欢迎农民自由来学校参观农场、鸡场,师生热情接待,并经常向他们介绍农业生产知识,如培养优良品种,科学饲养家禽等,和农民建立了深厚友谊。

若不是对农村教育改革抱持极大的热忱,匡互生在艰困办学之际,大可将心力置于他处,但他没有。从这段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他和立达学生是如何走入农村,以知识和理想构筑出一个乡村民间逐步改善的新境地。

在这场“走向民间”的运动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雄辩滔滔,以及实验所吸引的目光,比较容易忽略了还有一批批默默在乡村角落奉献知识、心力的人。经亨颐、匡互生、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不是光芒耀眼,但却也自有其动人的光与热;他们虽然在不同的民间岗位上,但是,都怀抱着一样的人生理想,也有志一同地在这条相近的民间之路上,并肩前进着。

四、从“新村意识”看白马湖作家群的民间性格

从“走向民间”的思想再进一步产生对新村的向往,是对白马湖作家群的民间性格的合理推测。事实上,这两种“大同小异”的社会思想,在二十年代便被一起提起、讨论,这也就是何

以身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必须在许多场合演讲或写文章时,对这一问题提出解释的原因。“走向民间”运动者的走向农村,基本上扮演的是“指导者”、“改造者”的角色,但周作人主张的“新村”中,却是相互尊重,各尽所能,不分阶级,权利平等,没有改造被改造问题。新村运动的传入中国,周作人是最重要的推手,以其在二十年代如日中天的文坛地位,这场运动迅速风行一时,结合当时政治的混乱,人心的苦闷,这个“乌托邦”的理想,自然成为知识界讨论的话题,甚至影响了不少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革思想。白马湖作家群中的经亨颐、夏丏尊、匡互生、郑振铎等人的新村意识应该就是受到他的言论的启发。

一九一九年三月出版的《新青年》六卷三号上,周作人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可以说是中国有关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虽然在他之前已有署名“蔼蘊”者在《劳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美国兰路共产村游记》(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日),但显然未引起太多注意。周文一出,立刻引起热烈的关注,包括左舜生、李大钊、郭绍虞、沈玄庐、王光祈、胡适、瞿秋白、陈独秀、吴觉农、王统照、邵力子,甚至毛泽东等人,都有相关的文章、书信讨论这种被称为“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事实上,在日本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于一九一八年在九州岛日向建立起第一个日本新村实验地以前,美国早已有了“共产村”,而英国也于一九〇二年在伦敦附近建立了第一个新村——利处华夫园城,又于一九二〇年兴建第二座新村“华尔温园城”。利处华夫园城经过不断的经营,到一九二三年止,已有人口一万四

见金廷辅《忆匡互生先生与立达农村教育科》,《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207页。

例如他刊于1920年《新青年》第7卷第2号的《新村的精神》一文,就曾提到:“中国近来社会上发生几种运动,颇与新村相像,原是很可喜的事。但实际上还有几个异点。”他特别举当时上海北京新闻杂志上讨论热烈的“平民新组织”的成立,说明新村与平民新组织的不同:“照那计划看来,是以改良平民的生活为重,组织的人立于指导者的地位,仿佛与19世纪中间俄国的‘往民间去’那种运动相似。这样办法,和新村的注重先自实行人的生活,使人晓得了,可以随意加入,逐渐推广,造成合理的社会便很不同了。”

千人,住宅、商店、公共机关、工厂等三千一百三十八所,包括消防局、医院等公共事业,足球场、戏院等娱乐事业,小学、教会学校等十余处,以及商店、工厂、周报出版等,由村委员会做全面而完善的规划,交通发达,生活便利,堪称应有尽有的完善小社会。虽然离新社会的实现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新村理想的实行在此已有了初步的雏形。然而,这些西方新村的介绍,终究不如周作人所鼓吹的日本新村。在已见的新村运动关系文件中,九成以上都是针对周作人及日本新村的讨论,可见周氏的影响确实深远。

在周作人的心目中,理想的新村模范是日本的日向新村,而非英国的利处华夫园城。英国式的新村是一种都市的重新规划,只涉及到形式上的改良,而且必须稍有资产者才能参加,这是后工业化社会中部分人的“自力救济”,如能普遍实施,当然也是人类理想社会的一种形态,但是,置之于工业落后、农村凋敝、战火连年的中国,其不适用已属必然。周氏的心仪日式新村,不必然是相互比较后的选择,主要还是他个人的日本经验。他到日本留学,娶了日本妻子,对日本文化的向往等,使他对日本的种种有心理上的“接近感”,也易于迅速吸收日本的新信息、新思潮。周作人在留日期间,就已深为“无政府主义”所吸引,对他来说,接受新村思想是很自然的,加上他对武者小路实笃所提倡的和平主义、超越国界的人类之爱等主张深深敬服,遂使他成为新村运动的追随者,而且在亲自走访了石河内村、日向新村之后,他深受震撼,“感动欣喜,不知怎么说才好,似乎平日梦想的世界,已经到来”(《访日本新村记》)。他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乌托邦”,于是,回到中国后,他一连写了多篇文章鼓吹,甚至成立了“新村北京支部”,成为新村运动的代言人。

周作人在这些文章中,反复强调的基本信念有两个:一是“各人应各尽劳动的义务,无代价的取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食衣住”;二是“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人,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新村的精神》)。在这个基础上,他作了许多阐释,例如新村的生活形态是“以协力的劳动,造成安全的生活”,“各尽所

能,各取所需”,主张劳动与生活不可分割,完全以互助、互相依赖为本,但是“一面提倡互助的共同生活,一面主张个性的自由的发展”。在新村的理想上,他说:“新村的理想,这将来合理的

有关英国新村运动的资料见邵元冲《英国的新村运动》一文,收于1924年出版的《新南社》第1期。利处华夫园城的构想,源自英人哈华特(Ebenezer Howard),他于1898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新村计划的书《明日的园城》(*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1902年,有十几人根据哈氏的办法,组织一个“园城先驱公司”,集了约15万磅股本,在伦敦北部34英里以外的地方,叫利处华夫(Letchworth),买了三千八百多亩地,建了利处华夫园城。所谓“园城”,就是哈氏对新村的别名,他认为新村是一种极美丽像花园似的城市,并非真的花园。这个名词逐渐流行起来,所以受哈氏影响而组织的两个新村都采用“园城”一名。

邵元冲就指出,英国“园城”的理想,只是消极的少数人找一块清静的地方来度他们较安舒的生活,这只是一种自救主义罢了;而且,能移居到此新村来的人,都是稍有资产者,如果是无产阶级,就无法租地造屋,享受新村的幸福;更重要的一个缺失是,现代既有城市的不适于生活,一方面是因为计划不周,但主要是经济组织的不良,而英国的新村运动只着眼于机械式的科学式的改善都市生活,对于现代经济组织却不思从根本改造,因此,他认为英国的新村运动绝无新社会实现的可能。

根据日本学者尾崎文昭《周作人新村提倡·波纹(下)》末所附之《“新村运动”关系文献一览》,共收录周作人、李大钊、王光祈等国人所撰之文献资料80篇,除了4篇讨论美国新村外,其余均为讨论日本新村的。该资料集中于1919至1921年,这也是有关新村主义甫传入中国、广被讨论的时期。此文见日本“论说资料保村会”编《中国关系论说数据》第33卷之2(下),第81-85页,收入《明治大学教养论集》237号“外国语·外国文学”部分。

无政府主义思想最早产生于欧洲,到19世纪50年成为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创始人是法国的蒲鲁东,继之又有俄国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作为政治思潮,它反映了一种企图保留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20年代初期,无政府主义被一些人视为是一种改造旧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新思潮”,而对思想界有过广泛的影响,李大钊、毛泽东、巴金等均曾受其影响。然而,它很快被认为只是披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外衣而已,于是毛、李等人便抛弃了它。不管是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共产主义,都是五四时期被引进的新思潮。正因为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的“不彻底性”,后来遂被称为“空想的社会主义”,而与被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有别。

社会,一方面是人類的,一方面也注重是个人的”,“不仅是为个人的自由,实在也为了人类的利益”,“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一句话,是人的生活”。至于他主张新村运动的动机,最重要的理由在于它是改良的,而非革命的。他说,新村的人虽然对现今的社会组织有所不满,也想从根本上去改革它,在终极目的上与别种主张并无太大差异,但在方法上不同,因为新村“不赞成暴力”,希望以平和的方式造成新秩序,而他是喜欢平和的,因此赞成新村的办法。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新村运动的好处是既“顺了必然的潮流”,又可免去“将来的革命”,新村是主张“缓进的革命”,反对“翻天覆地,惟铁与血”的暴力手段。我认为,正是这样的一种思想,使他一生的道路始终是向着“乌托邦”、“无政府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倾斜,而没有倒向激烈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诚如武者小路实笃的名作《一个青年的梦》(分四次在《新青年》登载)所描绘出的人类美好愿景,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众多青年知识分子都不禁感染了这种理想的希望,也做起相同的梦。自耕自食的劳动简约生活,人类与个人的协调统一,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工学主义,工读互助等,在在都让二十年代的青年觉得在思想上有一条新的出路。有趣的是,许多知识分子认同了这个运动,也努力求其实现,但为首的周作人,却始终只是心向往之。到日本新村去朝圣之后,周作人的具体行动是在北京成立“支部”,然而,也仅限于此。他自己承认:“我在北京设了支部,表明是个通信机关,支部的事业也只限于精神的宣传,不敢说到预备实行。”照他自己的说法,不敢实行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这倒是实情,因为日本的新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不论如何,这个隐含有“世界大同”的人间梦土理想的提出,确实深深打动了五四时期为国家、人类前途忧心如焚的知识分子们。

在有关白马湖作家群的资料中,我们很少看到他们对此直接发言的记载,只有郑振铎、夏丏尊两人略有谈及。可是值得注意的是,白马湖作家群不论在浙一师、春晖或立达时期,都有新村意识的部分“实践”,让人不得不相信这场运动对他们的思想确乎有着一定的启发。而他们

的呼应,有部分原因还是出在他们本有的民间性格上,使他们接受了这种超越国家意识、面向人类终极理想的新村境界。

先谈郑、夏两人的意见。郑振铎曾于一九二〇年六月八日致书周作人,信中表示“我们对于新村运动,很有研究——实行的兴味;我个人尤有想去实行的意思”。郑振铎并没有付诸行动,但他对此运动是支持的,后来他邀请周作人到他组织的“社会实进会”中讲演了周氏有关此一运动最有系统的一篇报告——《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两人并因此开始密切往来。夏丏尊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写于白马湖、后来发表于《东方杂志》第二十卷二十号的长文《日本的一灯园及其建设者西田天香氏》,是他对社会改革立场的自剖。他提到,在日本现代社会改革家中,他最“神往”的人有三位:一是武者小路实笃,“武者小路氏和新村,经周作人介绍以后,国中知之者已多”;二是终身在贫民窟与贫民为伍的贺川丰彦;三是建设一灯园教团,为人服务、光明祈愿的西田天香。他介绍了西田天香的生平、一灯园的组织、人生观与生活方式等,夏丏尊主张和平渐进改革的态度于此也显现无遗。他指出,社会改造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壮士、革命者,一种是圣者、宗教者,而日本社会家也有这两派,“第一派的革命式的运动,时有大规模的动作,可是究未曾十分收效。至于第二派的宗教式的运动,却常在小范围中,表现着惊人的奇迹了”。因此,他特别“神往”的都是具有宗教情怀的社会改革

有关周作人对新村的主张,见《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新村的精神》、《新村的讨论》、《日本的新村》等几篇文章,分别收入《艺术与生活》,台北:里仁书局,1982;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下册,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

大陆学者钱理群指出,周作人的新村运动主张,得到以李大钊为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热烈赞同,甚至比较年轻的一辈如毛泽东、恽代英、蔡和森等,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也曾被新村思想所吸引。他认为,新村运动可以看作是他们“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一座桥梁”,见钱理群《周作人传》,第232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周作人的确也只是搭了“一座桥梁”而已,他始终还在自己的“乌托邦”里,并没有走向桥梁的那一端。

周作人:《新村的讨论》,《周作人集外文》,第321页。
《周作人集外文》,第229页。

家,自耕自食营造新村的武者小路实笃,与贫民为伍、走入民间的贺川丰彦,甘于人间最下等生活的西田天香,这不正是最朴素、最真实的民间本色吗?

对于夏丏尊的新村意识,朱自清在《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中有清楚的介绍:“夏丏尊先生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远的理想,可并不是空想,他少年时倾向无政府主义,一度想和几个朋友组织新村,自耕自食,但是没有实现。”由此看来,夏丏尊的确是赞同新村理想的,虽然他并没有真正实现“新村”,但在浙一师及春晖、立达,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新村的影子,夏丏尊在其中必然扮演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春晖中学,朱自清说,经亨颐校长“似乎将学校的事全交给了夏先生”,因此在春晖也最能表现出他的这番理想。在《春晖的使命》一文中,就流露了他的新村意识。陈星对此的推论值得参考,他说:

在这篇文章中,他所谓的“乡村运动”除了没有提自耕自食的新村理想的主要内容,在其他方面,如帮助不识字的乡民识字,在别的公立学校风潮迭起、丑秽得不可向迩的时候竖起真正的纯正教育大旗,文理农与师范并重,男女同校,以精神力量战胜物质困顿等,都反映了他理想化的新村思想理念。

当然,新村理想的本质与学校教育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在学校中必然只能部分实践,这其中又以劳动互助、自耕自食得到较大的落实,我认为,这与校长经亨颐的认同与支持不无关系。以浙一师来说,它附属的小学就已经由教师试行了“新村制”,新村中的各级干部也都经由民主产生,虽然详细的实行状况,因缺乏进一步的资料可考,无法得知,但“新村”理念已经进入校园。以劳动互助来说,浙一师“广大的后校园……由学生开辟为果园和菜园,学生分片包干,自觉荷锄浇粪”,也算有了具体而微的尝试。

当经亨颐创办春晖中学,夏丏尊与匡互生是主管校务与训育的两大支柱,新村理想中的自耕、劳动,也自浙一师延续下来。应邀到春晖

来讲演的吴觉农,就针对这一点作了详尽的阐发,虽说是对学校的“希望”,但也等于替春晖的新村工作设计了几项可行的实施步骤。例如第一项“造林”,他希望春晖中学“大大能够购山造林,不但使白马湖的水色比今日澄明清洁,且一二十年后,可充学校的基金”;第二项则是立即可行的“牧畜与养鱼”,因为“春晖中学离市较远,蔬菜的供给已感困苦,而动物的食品,更觉为难……如果能于校旁隙地,养鸡数百尾,则鸡卵供给就很裕如了……春晖如能够用优良乳牛数头,小之可以供给校内的需用,大之可以分配种牛于乡间。又沿白马湖边,地积数百亩,如能养鱼数十万尾,则课伴之暇,湖滨垂钓,打泉捕鱼,一校数百人,不患食无鱼了,其余如羊、豚、鹅、鸭,都可随时豢养”;第三项则是“灌园植卉”,他建议“春晖校可租地数亩,采良种,用新法,施肥料,辨土宜,栽培主要农作物三五亩,如果得法,不难使农夫争先效法,栽植果木瓜果蔬菜,虽是一种末道,但也能供给不少的食用”。

除了这三项可达到自耕自食的方法外,对于“互助”的新村理想,吴觉农也提到可以试办农民银行,他说:“春晖中学既有存款,我想不妨扩出三五千元来,试办一个农民银行,在校里的收入无损,而附近的农民能够以低利来融通资金,不知受福多少啊!”如果上述几项都能做到,新村的自耕自食主张就可算是落实了。以目前资料来看,除了农民银行的开办有待查证外,其他的建议大多在经亨颐的同意下一一进行,而且成效不错。

在春晖的新村实验,匡互生的投入比夏丏尊更为积极。其实,在就读北京高等师范数理部期间,他就曾和同学组成“工学会”,这是实行半工半读的社团,后来匡互生的重视生产劳动教育,肇始于此。一九二〇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主任,校内事务都由他规划,但他和几个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460页。

陈平原:《游心与游目》,第15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近代著名学校和教育家》,第10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杭州一中75周年校庆筹备办公室编:《杭州第一中学校庆75周年纪念册·本校简史》,第6页,1983。

朋友都感到学校教育对社会的影响非常缓慢,于是便去职而投入新村实验,先后在杭州上纤埠、宜兴凌家塘进行实验,半工半学,自耕自食,很有一番规模。然而两次都因资金不足而失败。一九二二年时,他便想集合志同道合者自办学校来加以实验,但事实不易做到。来到春晖,与曾在湖南一师任教的夏丏尊共事,两人理念相近,匡互生自然想在春晖大展身手。匡互生的学生魏风江回忆道:“匡先生在春晖时,原定创办一个农场,设立农科,因为培养学生劳动生产的能力,是他教育理想的主要内容。”

离开春晖,到上海筹办立达学园,他的新村思想获得更大的发挥空间。朱光潜说匡互生在春晖时“和无政府主义者有些来往”。无政府主义的反对强权、自由博爱、工作互助等,和新村思想并无太大差异,匡互生都深受影响。例如一所学校,总会有校长,但立达学园没有,虽然他是大家一致公认的精神上的校长,但是名义上的校长没有,也不设主任等职,这正是匡互生受到无政府主义中主张“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影响的结果。至于新村运动的自耕自食等主张,在立达有十分广泛的尝试,尤其是一九二九年成立农村教育科以后,工读并行的特色更为明显。养鸡、养鸭、养猪、养蜂、养鱼、种植蔬菜、花卉,农场分为鸡场、蜂场、制造场和园艺四部,经营得有声有色,规模可观。匡互生指出,一九三二年立达校舍受“一·二八”战火炸毁以前,农场每年至少可获纯利一万二千元,农教科学生每人每月至少可生利三十元。可见立达的新村实验已有不错的发展基础,要达到完全自耕自食是很有可能。

匡互生对劳动生产教育的重视,从他对“耕”字的解释即可晓知。他说,“耕”有三种含义,一是“我们该用自己的劳力和较善的技能,先生产最需要的农产物,来维持大家的生活。耕的目的在满足需要而不在赚钱”;二是透过“耕”可以使人爱自然,爱土地,爱质朴的生活,并引起对农村的浓厚兴趣;三是“简单的平常的工作,如煮饭、扫地,等等,实则都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要重视这类工作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匡互生的劳动生产思想,不局限于经济,而是重视“在于生产中体会生活的意义”,希

望学生“从养蜂中体会‘信仰科学’、‘细心’、‘有恒’的生活,从园艺中体会‘生机’、‘生趣’、‘认识自然力量的伟大’、‘同情农民的窘困的生活’”。在立达创办旨趣中,他也对劳动的意义有所强调:“我们坚信劳动可以养成刻苦耐劳的习惯,可以使我们领略创造的快慰,可以使我们独立生活,不完全为社会上的消耗者”,因此,他勉励立达的师生“一方面要极力过俭朴的生活,使精神不易为物质欲所屈服,一方面要实行劳动,每日费若干时间,到工场农场去做工”。他在立达的校务推动,很多构想就是源自于他的新村理念,也获得全校师生的认同。

立达学园的民间性比起春晖中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新村色彩也浓厚得多,除了前述具有新村意识的一些见解与做法外,从“学园”两字,也可看出匡互生建构乌托邦的理念。他坚持以“学园”取代“学校”,是有着令人十分向往的美好远景的追求。他说:

凡是真正园艺家,往往把他看作极有趣味的事;他虽然有时很劳苦,但不觉得

魏风江:《从春晖中学到立达学园的匡互生先生》,《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154页。

朱光潜:《回忆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119页。

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战事,使立达学园的校舍几乎全毁,师生必须避难迁徙。战事平息后,匡互生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形下,多方奔走重建,将立达又恢复起来。他曾写一篇《立达学园恢复的经过》,详述此事,其中对受灾之前立达农场的经营成绩,使我们看到“自耕自食”的具体清单。他指出,当时鸡场有价值万元以上的种鸡三千余只,价值万余元的产卵鸡七百多只,还有雏鸡八百多只,大小鸡舍五十余间,价值一万五千元,还有其他各种机器设备;而蜂场也初具规模,有种蜂百余箱,用具若干种,纯蜜一千余瓶;园艺部有大小水蜜桃千余株,花卉数十种,蔬菜十余亩。规模确实不小。

《匡互生与立达学园》一书附有“立达学园高中部农村教育科一览”,在“本科旨趣”中,匡互生对“耕”、“读”两字作了精辟的解析,此处所引见该书第288页。

后可:《匡互生先生的思想》,《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264页。

匡互生:《立达、立达学会、立达季刊、立达中学、立达学园》,《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24页。

苦,反很觉得愉快。他们在自然的天地中,常常见着各种花木欣欣的向荣潜滋暗长,不知不觉的盎然有生趣,不会走到干枯寂寞的路上去,他们又往往忘记了利害的打算,诈伪的行为;他们终日与自然为伍,成了一真实纯洁的人。我们很觉得教育也应该这样。无论教育者,被教育者,大家都把学校看作“美的世界”,看作“艺术的宫殿”,都感着深的趣味,大家在那里,无论做什么事,都不是为什么权利义务的压迫而做,也不是为什么实际的利益而做,只是因为觉得非如此做不快活,只是因为觉得非如是做不得安慰自己。我们希望教育者有真正的园艺家一样的趣味,所以叫学校做学园。

跳脱传统对教育体制的思维,“学园”的民间自主特性更为明显。不仅如此,他对学园中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也都以栽培花卉的态度来面对。他说:“凡是花园,又是极广大极自由的。其中各种形形色色的花草,无论是大的小的红的白的,本国的,外国的,都可兼收并容,各自发展,学校的培养人才,也该和这一样。”既主张互助的共同生活,又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这个说法和周作人是如出一辙。我觉得他和周作人恰恰是个对比,周作人是理想家,而匡互生是个实行家。刘熏宇形容他是个“质朴的理想主义者”,而且“他这样认定,就不再思索,就勇往直前地干”,不像周作人的在书斋中犹豫徘徊,经营个人的乌托邦。

匡互生于一九三三年积劳成疾而逝。他没有想到,他在立达的理想会香火传承下去。信仰无政府主义、自称“安那其主义者”的巴金,在五十年后,对匡互生有一段极为生动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在民间角落,新村理想的微弱之光,竟曾散发出一些温暖而美好的亮光:

我没有在立达学园待过,但我当时(按:一九三三年)正住在那位广东朋友创办的“乡村师范”里(按:在广州),跟教师和同学们一起生活。学校设在小山脚下三座并排的旧祠堂内,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大家在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作息,用自己

的手创造出四周美丽的环境,用年轻的歌声增添了快乐的气氛。我作为客人住了五天,始终忘记不了在这里见到的献身的精神,真诚的友情,坚定的信仰和乐观的态度。我和广东朋友谈起,说了几句赞美的话,他说:“我是匡先生的学生,不过照他培养人、教育人的思想办事。”

这种民间的力量,看起来微弱,却是最扎实、最持久的。如果以官方的力量来强制实施,反而会揠苗助长,未蒙其利却先受其害。

五、走向民间:世纪末知识分子的一种可能

从夏丐尊到匡互生,从春晖到立达,我们看到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影子,一些新村理想的影子,但却看到了彻彻底底的民间性格。在民间的位置上,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理想邦”(eutopia)锲而不舍的追求,虽然这个理想似乎逃避不了最终成为“绝望邦”(dystopia)的宿命,但是建构人间美好梦土,寻找平等、自由、互助的桃花源,替人类的未来打造一条出路,至今仍是每一个世代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怀抱。

一九二〇年代,白马湖畔的这群知识人,坚持着“学在民间”的念,有的投入“乡村重建”的行列,有的追随新村运动的步伐,有的一生守着教育的岗位,有的从事写作、出版的良心事业。他们以“开启民智”为己任,献身于平民教育的推广工作,秉着知识与良知,或议论时政,或钩沉学术。他们站稳了民间的立场,敢于向军阀恶势力挑战,向日本军国主义还击,向各种污浊的政治斗争抗议。他们来自民间,走向民间,为我们走出了一条至今仍值得深思的道路。

【作者简介】张堂绮,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华语文教学学程主任、民国历史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匡互生:《立达、立达学会、立达季刊、立达中学、立达学园》,《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29页。

巴金:《怀念匡互生先生》,写于1983年8月22日,收入《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76页。